

從中國發展的悖論談起

陳方正

《二十一世紀》滿二十五周歲了。我們的發刊詞〈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開頭是這樣說的：

在本世紀，中國人心裏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風雨中它並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動、閃爍、終告熄滅。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時候是這樣，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運動已經推行十年之後，也還是這樣。中國，有這樣悠久文化傳統，這樣優秀人才和龐大潛力的中國，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機之中了。

那是1990年10月的話，其時在「六四」慘劇之後剛一年多，所以這段話裏面的「希望火炬」和「遭到挫折」所指，一般會被理解為民主進程。那當然不錯，但也不僅僅如此，因為下文討論的重點是現代化如何能夠「穩定和持續地在中國進行」。何謂「現代」？文中提到了三個不同的層次：「下層的技術、產品」；「上層的知識、經濟結構、社會動力」；還有建基於「自由、平等、人權、契約、民主、法制」等抽象理念之上的制度。因此，當日我們所深深感到憂慮的，不僅是民主火炬的熄滅，也還有現代化整體進程所遭到的重大挫折。

一 中國現代化的悖論

但歷史不會重複，也永遠令人驚訝！今天重讀這段話，委實令人感慨萬千。當時誰能想像，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當時被視為民主改革榜樣的蘇聯早已經崩潰不復存在多時，而我們曾經為之感到那麼沮喪、那麼失望的中國，卻宛如在百年噩夢之後醒來，一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被公認為能夠與當今世界唯一霸主美國相頡頏的強國呢？但還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中國卻仍然趑趄不前——不但如此，而且，對於

西方國家以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接受的民主體制，執政者卻認為並不適合於中國。那也就是說，在上面所列出的現代化三個層次之中，中國已經在第一、二兩個層次取得長足進步，但在第三個層次，卻停滯下來了。換而言之，前者的進步並不以後者的改變為前提，富強不需要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兩者可以完全脫節。這驚人悖論，是我們所不能不面對的。

在作進一步討論之前，以上的說法有兩點需要澄清。首先，不少論者認為，今日中國根本不能夠算是富強，它國力上的表現，只不過反映人口眾多和政府對人民的極端壓榨而已。這個看法並非全錯：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僅及世界平均值的八成，比之中等發展國家如波蘭、智利、土耳其都還相差甚遠，所以只是國富，而不是民富。但富與強是分不開的，國富則國強——那不僅僅表現於軍力或者太空計劃，還牽涉多方面與多層次的科技、交通、基建乃至經濟、金融體制，這些都絕不是單純可以靠人民眾多，或者可以用金錢換來，更不是靠「壓榨」取得。中國目前的政府支出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24%左右，遠遠低於美國的42%，英國的49%，或者瑞典的51%。當然，西方國家大部分政府開支是為社會保障與福利，而中國的政府開支則以基建和科技投資為主，兩者結構不同，難以詳細比較，但即使從其份額只佔GDP四分之一，也可以知道「壓榨」之說是不能夠成立的。其次，中國官方雖然也認同「自由、平等、人權、契約、民主、法制」等理念，但卻認為它們在中國有獨特表現形式，因此不需要也不應該「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說中國在民主的道路上「趑趄不前」，主要指西方式民主，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開放性、競爭性普選，以及多數黨執政的制度。這套制度的實施雖然和自由（包括言論、通訊、結黨等自由）、人權（包括人身和財產的保障）、法治（包括司法獨立、清晰具體法律條文的訂定與公布、依法公開審判等制度）密切相關，但並不是同一回事。

那麼，從中國過去二十五年的發展經驗看來，就必須承認，單純就追求富強這目標而言，西方式民主似乎並不是必須的。也許，這一點還可以從新加坡和印度的經驗得到佐證。新加坡是過去半個世紀世界上發展最為成功的一個例子，它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最富裕，教育、科研最發達的一個國家。但如所周知，長期以來，它法治昌明，國民享有選舉、結黨自由，在名義上也實行西方式民主，但就政治而言，實際上卻是由人民行動黨以種種手段嚴密控制的國家，稱之為「家長式一黨專政體制」更為適當。印度正相反，它獨立之後在中央和地方都全面實行英國式議會民主，但由於國家的龐大和複雜，國民大會黨雖然有輝煌歷史和聲望很高的領袖，卻一直無法有效管控全國，因此這個「全球最大民主政體」的現代化進程命途



多艱，迄今人均GDP還及不上中國的一半。從這兩個例子看來，最少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和富強的確不見得有必然關係。

二 民主本身的價值何在？

但即使接受了這一點，我們也還需要面對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完全撇開它和富強的關係，民主是否還有它本身的價值，因此也是個應該採用的良好制度？這個問題高度複雜，很不容易回答，但也極其重要，是不能夠迴避的。限於篇幅，以下我們只能夠把幾點粗淺的想法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首先，很明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現在已經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用，顯著例外的，只有在婆羅洲和阿拉伯半島上那些藉着石油致富的首長國或者王國而已，而上面提到的新加坡，現在也面臨巨大壓力，要朝政權開放和社會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了。因此，將西方式民主稱為世界潮流，並不為過。然而，這並非自然發展趨勢使然：它是有政治背景的。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都可以說是西方從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中葉宰制世界所留下來的遺產：中南美洲和非洲眾多國家如此，印度、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更是如此。在此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繼續強力鼓吹和推銷其民主理念，冷戰最終以蘇聯崩潰告終，俄國、東歐和巴爾幹眾多國家的民主化就是其結果。既然如此，那麼西方國家要將民主體制奉為「普世價值」，是很自然的。換而言之，中國今日獨自屹立於西方民主體制以外，其所反映，正就是它始終沒有為西方所完全宰制這一事實——鴉片戰爭之後沒有，抗日戰爭中沒有，冷戰時期沒有，蘇聯崩潰以後同樣沒有。

能夠堅持獨立自主固然值得驕傲，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中國的現代化不正就是放棄閉關自守，轉而全面擁抱「改革開放」得來的嗎？改革開放的核心，不就是全面吸收西方的科技以及仿效它的經濟與金融體制嗎？因此，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否適合中國，還是需要客觀地認真考慮，不能夠純粹因為它是「外來」，就加以排斥。事實上，在上述四者之中，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是中國官方所認同的——雖然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政治、社會狀況之下，它們的實施還非常不健全，並且受到嚴重限制。因此，我們需要集中討論的其實是民主——當然，這裏指的是西方式民主。

我們首先需要詰問：民主為那麼多先進國家擁抱，它的無比魅力、它的秘密到底在哪裏？有不少人認為，唯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抑制腐敗、建立法治、保障人權與自由等問題才可以真正得到解決。對此，我們不敢苟同。事實上，這些說法是很可疑的。例如，在新加坡的「家長式一黨專政」模式之下，腐敗和法治問題同樣得到解決；在港英治下的香港根本沒有任何民主可言，但法治完善，言論自由也十分充分。除此之外，有力得多的反證也比比皆是。在民主的印度，貪腐問題之嚴重，以及低下階層婦女的人身安全之得

不到保障，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必細表。國人很少注意或者談論的是，作為民主大本營也號稱具有深厚法治傳統的美國，卻屢屢傳出警員當街槍殺黑人青年然後又逍遙法外的事件，最近發生於密蘇里州費格遜(Ferguson)小鎮者只不過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而已——而且，此類事件多年來始終無法根絕。更駭人聽聞的則是，以2009年計，美國人的監禁比率(incarceration rate，平均為0.7%)不但遠高於全球任何其他國家，黑人成年男子的比率(4.7%)又遠遠高於白人(0.7%)，是後者的7倍。倘若所謂「法治」的結果竟然是如此，那麼它能夠說是保障了人權嗎？甚至言論自由，在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時代的美國，不也同樣受到踐踏，而未曾得到民主體制的保障嗎？我們舉出這些例子，絕不是要抹殺在許多民主國家之中，法治和公義得到彰顯的事實，但它們的確有力地證明，民主體制並非萬能，它不能夠解決許多困難的——由歷史、習俗、政治形勢或者民眾教育水平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因此，官員腐敗和法治不彰這類問題的存在，和民主體制並沒有必然關係，它們也不能夠指望單純通過政治的民主化而得到解決。

三 西方民主的秘密

其實，西方民主的秘密，還得通過歷史追尋。它起源於古希臘城邦的全民大會，那由所有成年自由人(每邦約數千人)組成，對邦中一應大小事務都有決定權，而在對外戰爭中，每人也都有為邦捐軀的義務。此後羅馬共和國、中古北意大利城邦，還有瑞士諸邦，其政體都是由此發展出來，但他們的公民數目和所需處理事務已經大大增加，因此又發展出選舉代表和執政官的制度，以及種種制衡權力的機制。至於英國的議會，則本來是諾曼地人入主英倫之後，國王與貴族、大主教就國家所需稅款討價還價的機制，小地主和市民的參加，是後來的發展了。到了十八世紀，來自日內瓦城邦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所提出的「民主」觀念，還是建基於所謂「集體意志」(the general will)觀念之上——雖然那已經被抽象化，成為「主權」和「法治」的代名詞，但希臘和瑞士城邦運作的痕迹，仍然未曾完全泯滅。這西方民主的歷史，有一條線索貫穿其間，那就是權利生於義務，人民有納稅和為國捐軀的義務，所以也就有權通過民主制度參與政治——在此意義上，人民整體就是國家。因此，西方式民主的秘密並不在於它能夠達到甚麼具體目的，而在於它反映了一個具有久遠歷史根源的國家建構原則。

這個原則的獨特和優勝之處，在於它能夠為由是而產生的政府提供正當性(legitimacy)——無論那政府的表現如何。因為，說到底，那畢竟是人民自己選擇的政府，而且，它並非最終選擇，而是可以定期更換的。除此之外，它對全體民眾有自然的感召力，因此能夠產生巨大全民動員力量。這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對外戰爭中顯出了巨大威力，在其後多次國際和全球衝突中，

更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本質。自十八世紀以降，它能夠以風捲殘雲之勢，徹底改變歐洲和美洲的政治格局；到了二十世紀，又能夠為西方那麼成功地推銷到全世界，其秘密實在於此。

四 中國會走向西方式民主嗎？

不過，對中國當今執政者來說，以上這一切恐怕不見得有多少說服力。畢竟，在他們看來，歷史上他們是在劣勢之下成功地動員全民力量，打敗強大對手，而取得政權；其後又成功克服了自己的嚴重錯誤，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在最近三十多年間，更是逆着歐美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所認為的金科玉律，而創造了經濟上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使得佔人類五分之一的這個古老大國，重新發出宛如昔日的光芒。更何況，他們並不是幾個家族，或者一個自利的小團體，而是一個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的巨大政黨，它通過各種不同渠道，與全國人民不斷互動、磋商，因而是與全民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誠然，他們雖然全力打貪肅腐，但中國還有無數令人髮指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未曾解決，甚至好像無從解決——但美國就沒有它無從解決的警員當街槍殺黑人問題、印度就沒有它根深蒂固的婦女地位與安全問題嗎？說到底，西方式民主是通過政權的建構形式，來為它所產生的政府提供正當性；而中國當今執政者，則是以他們過去數十年來在艱困環境下所取得的驕人成果，以及他們憑長期經驗發展出來的實質性全民磋商機制，來為自己提供正當性。兩者的優劣高下，無法輕易判斷。

中國人是講究現實的，短期內很難想像中國的執政者會拋棄目前在經濟和建設上那麼成功的體制，而轉向西方式民主。正所謂殷鑒不遠，蘇聯熱情擁抱了西方式民主，結果導致崩潰和大災難，那慘痛教訓當然不可能被忘記。那麼，西方式民主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自由、人權、法治，對中國就再也沒有意義，它們的「普世性」就絕不可能延伸到中國來嗎？我們倒不這樣看，因為這種想法並沒有考慮到兩個長遠變化，即是經濟大發展所導致的社會變革，以及當今執政者本身為了適應這種變革而會出現的蛻變。換而言之，我們認為，那些「普世價值」要在中國這塊龐大而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是必須經歷一個漫長適應過程的，而中國的高速發展，恰恰就為此過程創造了契機。

我們不可忘記，在快速經濟發展的推動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迅速改變。目前城市人口已經達到全國的55%，中產階級已經佔人口的25至30%（以年收入在9,000至25,000美元計），高校畢業生總數估計約佔人口6%。倘若中國當前經濟問題所反映的，只是發展模式從出口型改變為消費型所引起的暫時調整，而非它發展速度長期下降的先聲，那麼在今後十年即2025年的時候，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估計，中國GDP將有可能追上美國，城市化程度和中產階級份額也都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受過高等教育人口的份額則最少會超過12%。

那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結構將接近西方發達國家了——事實上，中國目前連串基本改革，例如從國有企業轉向私有企業，從出口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大力鼓勵創新和外向投資，加大高等教育和科研投資的力度等等，都是朝此方向邁進的。倘若這些改革能夠堅持下去，而上述的估計大體不錯，那麼屆時作為執政者的中國共產黨就將面臨一個嶄新課題，即如何適應一個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龐大群體（其相當部分是從事知識型或者創新工作）的需要，而不致窒礙其創意和才能的發揮，不致成為其絆腳石甚至緊箍咒。否則，它就難免落後於形勢，而為它領導下的中國本身所超越，甚至逐漸被邊緣化。

要適應那樣的全新形勢，黨本身很可能需要經歷一場變革，包括它的大規模擴張，即逐漸演變為全民性質的西方政黨，以及相應的組織結構鬆散化；與此同時，它的統治方式也可能逐步改變，即從家長式的一黨專政，轉為協商式的黨內多派別共同執政或者輪流執政；由是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可能出現調整。屆時目前有限度、不完整的自由、人權、法治觀念或許也將改變，它們更開放、更徹底的西方版本，可能通過「改革開放」機制，為未來的中國所逐步吸收。事實上，法治的重要性現在已經開始被意識到，法官素質的提高、待遇的改進已經在進行——當然，那些僅僅是一個微弱的開端而已，前面的道路仍然漫長。此外，一個高度知識化的社會要能夠有效運轉和繼續發展，言論自由和通訊自由不可或缺，因此它們由於實際需要而逐步開放，將是很自然的事情。說到底，發展或許可以從經濟或者物質層面開始，卻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此層面，而將會推進到建構理想社會的階段。很顯然，那已經超越經濟甚至當前政治的範疇，所以須要由社會整體共同承擔，而不應該由一個無論怎樣明智、有遠見的政黨來領導或者壟斷。

單純從人口看，中國可以與整個西方世界匹敵；但在富強上要與西方匹敵，則必須達到同樣發展程度，而那樣高度發展的社會是有其本身規律的。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到，要尊重經濟規律；同樣，在未來，他們本着一貫的踏實精神，當也同樣會尊重高度發展社會的規律吧。誠然，以上所有這些想法都不過是書生的管窺蠡測而已，但有一點卻無可否認：發展是個非線性動力過程（non-linear process），也就是說，事物的發展超過了某種臨界點，它就可能反過來影響、改變那引起發展的推動者本身。以中國發展之迅速，在今後它也很可能會達到那樣的臨界點，從而引起共產黨本身的蛻變。

二十五年前我們感到悲觀、失望和憂慮，今日卻有了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新的希望。毋庸諱言，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有不少對中國現狀是感到非常憤懣、悲觀和失望的。我們的看法和他們不大一樣。雖然未來仍然是隱藏在迷霧之中，但期待本刊慶祝創刊三十五周年的時候，中國會迎來另一種進步和新的驚喜，那也許並非不切實際的樂觀吧。